

未来的小人

杜文娟 译

未来的小人

1

“庸俗习气将会得胜并应当得胜，——赫尔岑 1864 年在一篇名为‘终结与开端’的文章中写到。——的确，殷勤的朋友，该平静地、驯服地承认，庸俗习气——西方文明的确定形式”。

要使赫尔岑厌恶欧洲是很难的。因为他正是那些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说是拥有“两个祖国：我们的俄罗斯和欧洲”的俄国人之其中之一。也许，他自己尚不知，更爱哪一个，俄罗斯还是欧洲。和他的朋友巴枯宁一样，他坚信，近来的解放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事业，而是所有民族、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只有摆脱自己民族的属性，加入全人类生活的圈子里，人民才能够彻底解放。“全人类”在普希金的观念中是审美认识，在赫尔岑，这位也是第一位俄国人的观念里则成为生命活动、伟大的英勇行为。他不是抽象地，而是现实地为了爱欧洲而牺牲对俄罗斯的爱。为了欧洲而变成了永远的放逐者，为它而活并准备为它献身。在气馁和失望时他感到遗憾的是，在 1848 年巴黎革命时没有拿起一位工人递给他的武器，没能在街垒战死。

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对欧洲感到可疑，那么不是因为怀疑少，

而是因为过于相信它了。当他发出自己的评判：“我看到了旧欧洲不可避免的毁灭并且不为所存在的一切感到遗憾”，当他断言，在旧世界内——“不是 ，而是死亡”，并且在他的额头上印着：“vixerunt”^①，——那么可以不接受这一判决，——我个人不接受它，——但不能不承认，在赫尔岑的话中该判词具有着可怕的分量。

为了论证自己的关于庸俗习气必然在欧洲获胜的思想，赫尔岑援引欧洲文化最伟大的代表人之一，欧洲文化的“毫不畏惧、无可指责的勇士”之一约翰·米勒的话。

“庸俗习气，——赫尔岑说，——这是米勒的专制政体的混合平庸（conglomerated mediocrity）的思想，这一思想支配着一切，——是开明的思想，但也是缺乏修养的思想……米勒看到，他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得庸俗、低劣；也绝望地看着从无数庸俗琐事之中浓缩出来的某种占绝大多数的压实的黑色咸鲱鱼子……他在谈到智力、精力的狭窄，谈到个性的磨蚀，谈到生活不断的浅薄，谈到全人类兴趣从其中的不断剔除，谈到将其引向商业的摊位和庸俗的富裕时完全没有夸张。米勒直截了当地说，沿着这条道路英国将会变成中国，——对此我们补充说：并且不止英国这样”。

“也许，某一危机将会使我们摆脱中国的东亚病夫的境况。但它将来自何方，如何来？——对此我一无所知，米勒也不知道”。“何处是那强大的思想，那狂热的信念，那能够锻炼身体，使心灵达到异常顽强的，既不觉疼痛也不觉苦难并以坚定的步伐走向死刑台，走向火堆的热烈的期望呢？看一看周围，——有能力鼓动人民吗？”

“基督教在宁静的、多石的变革的港湾搁浅、平静下来；革

① 拉丁语，“它们已不复存在”。

命也在宁静的、多沙的自由主义的港湾搁浅了……拥有如此宽容的教会，拥有如此恭顺的革命西方世界便开始落后、均衡”。

“凡是人的蚂蚁窝和蜂房得到相对满足与均衡的地方，——向前的运动就变得越来越安静，一直到，最终，最后的寂静到来为止”。

沿着“从历史中走出的亚洲民族”的足迹，整个欧洲以“安静的、温和的步伐”走向顺利的蚂蚁窝的这一最后的寂静，走向“庸俗习气的具体化”。

赫尔岑赞同米勒的观点：“如果在欧洲不出现某种突如其来复兴人的个性并赋予其战胜庸俗习气之力量的转折，那么，尽管自己有基督教，欧洲仍将会变”。

“想一想吧，——赫尔岑在给一为不知名的俄国人信的结尾写到，似乎，这封信也是给全体俄国人的，——想一想吧，你的头发都会竖起来的（不寒而栗）”。

米勒和赫尔岑都没有看到这一精神上的庸俗习气的决定性缘由。“我们根本不是医生，我们是——精神上的病痛”，——赫尔岑警告说。的确，在所有这些预言中，——不仅在米勒的，而且在赫尔岑的部分预言中，——在这些针对自身的预言中没有任何结论、认识，有的只是莫名的疼痛、莫名的恐惧之叫喊。赫尔岑和米勒看不到庸俗习气的缘由，正如没有镜子人便无法看到自己的脸一般。他们所为之痛苦的以及他人身上的令他们害怕的病痛不仅存在于其他人身上，而且也存在于他们自身，存在于对他们来说是最后的、不可逾越的乃至他们看不到的宗教的、确切地说反宗教的，意识的范围里。

所有欧洲文化的决定性界线是——实证主义，或者，根据赫尔岑所用的术语，“科学现实主义”，它不仅是个人的科学思维，而且是一般哲学思维甚至宗教思维的方法。实证主义在科学与哲学之中诞生之后，便由科学与哲学意识成长为努力以自身破除、

取代所有昔日的宗教。在此广义而言，实证主义是作为唯一现实的，向感觉经验敞开的世界之主张，也是对超感觉世界的否定；对在上帝里面的世界的结束与开端的否定以及对在现象中世界之无终无始的主张，有关无终无始的、对于人而言难以洞察的现象氛围、中庸、平庸，那一如中国长城一般绝对的、极其坚固的“混合平庸”、conglomerated mediocrity、那米勒和赫尔岑有关绝对庸俗习气的主张本身并不是指人们所言之最后的形而上学的深刻性而言。

在欧洲实证主义只是正在变化，——在中国则是已经变成了宗教。中国的精神根基，老子和孔夫子的学说——完善的实证主义，没有上帝的宗教，“地上的、非天上的宗教”，正如赫尔岑谈到关于科学现实主义时所说的。对于“彼岸世界”没有任何秘密、任何深入和渴望。一切都简单、一切都平凡。不可摧毁的健全的含义，不可摧毁的正派。拥有的便是现有的，别无他物，也别无他求。这里的世界——就是一切，除了这里的世界没有彼岸世界。天空——不是开始和终结，而是大地无始无终的延续。正如基督教所断言，大地和天空不是将来要统一，而实质上现在**就是统一的**。地上最伟大的帝国便是天国的帝国，地上的天空，中庸的王国——永远中庸、永远平庸、绝对庸俗的王国——“并非神的王国，而是人类的王国”，正如赫尔岑同样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理想所下的定义。欧洲对后裔、未来的黄金时代的崇拜与中国对祖先、过去的黄金时代的崇拜同出一辙。如果不是我们，那么我们的后裔们将会看到地上的天堂、地上的天空，——这是进步宗教的主张。在对祖先、对后裔的崇拜中同样都有唯一的人类的面孔、个性为无个性的、无数的种族、人民、人类——“从庸俗琐事中压缩的压实的黑色咸鲑鱼子”、未来宇宙的水螅虫和蚂蚁窝而所作的牺牲。摒弃上帝、上帝的个性，人必然会摒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人类的个性。为了蝇头小利、温饱而拒绝自己对上

帝的渴望和上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必然会陷入绝对的庸俗习气之中。

中国人——完美的黄面孔的实证主义者；欧洲人——眼下还是不完美的白面孔的中国人。在此意义上，美国人是完美的欧洲人。这里极端的西方与极端的东方汇合了。

那对于赫尔岑和米勒而言已经开始的，然而，大概，我们不会目睹其结束的中国与欧洲的碰撞，的确是特别有预见的。中国使实证主义的认识臻于完美，但实证的活动、在实际知识的实用技术方面中国则达不到。日本，不仅是东方军事的，也是文化的先锋，从欧洲人那里获取这一文明的技术领域并且立刻成为令欧洲人不可战胜之国。正当欧洲拿自己最好的大炮与低劣的中国炮对抗时，日本得胜了，并且这一胜利似乎是文化对野蛮的胜利。但当大炮在交锋时，文化也在交锋。似乎是，欧洲人的手中除大炮外一无所有，那它能以什么来展示其文化对野蛮的胜利。基督教？但“基督教变得浅薄了”；并且，对于欧洲内部的政策而言它还有某些相当令人怀疑的作用；但当越过欧洲的现代基督教不得不将自己的钞票换成纯金时，那么在它之后没有任何人提供任何东西。在欧洲即使最无耻的人也羞于谈论基督教有关像战争此类严肃的东西。曾几何时伟大力量的源泉——基督教如今成为极度虚弱乏力、危害自身的前后不一致性、所有西欧文化之矛盾性的源泉。基督教——阿利安人的血液中的这些旧的闪米特人的酵母——正是那使其最终不能稳定下来，妨碍最后的“结晶化”、欧洲的中国化之物。似乎，白种人的实证主义永远被“形而上学的及神学的时期”破坏，“浸湿”。一般黄种人的实证主义并且其中包括日本——这是一颗刚刚由黄种的蒙古母鸡与白种的阿利安公鸡所生的蛋——没有被任何东西破坏：二三千年间是什么样，如今便是什么样，并且将永远如此。欧洲的实证主义仍然是过于聪明，即肤浅，也就是，附着在表面上；黄种人——彻头彻尾的

实证主义者。许多世纪的文化财富——中国的形而上学、神学——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强化这一与生俱来的生理的天赋。

相信自己的生理作用者便是始终不渝者，始终不渝者便是强者，而强者便会得胜。日本战胜了俄国。中国将会战胜欧洲，只要在欧洲自身内部不实施伟大的精神变革，这一变革将颠倒其文化的决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基础并将允许与实证主义的东方的大炮相对抗的不单纯是实证主义的西方的大炮，而是某种更现实、更真实之物。

因此主要的“黄色危险”——不在外部，而是存在于内部；不在于中国在走向欧洲，而是欧洲在走向中国。我们的面孔还是白色的；但在白色的皮肤下已经流淌的不是昔日浓密的、红色的、阿利安人的血液，而是越来越稀的类似于蒙古人之浓血的“黄色的”血液；我们的眼睛的剖面是直的，但目光开始变斜、变狭小。欧洲白天直射的白光在变为中国的初升的或日本的升起的太阳之斜的“黄色”光。目前日本人似乎是换了装的欧洲人的猴子；谁知道呢，也许逐渐地，欧洲人乃至美国人将会成为换了装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猴子、那仅仅假装作新世界之绅士、实证主义者的旧世界之积习难改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也许，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战争——仅仅是误会：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一旦相认了，那么战争会以和平结束，而这将是“全世界的和平”，最后的宁静和上天的平静、天朝（中国）、从东方到西方的全地之中庸王国，最终的“结晶化”、全人类的蜂房与蚂蚁窝、连绵不断的围绕地球之庸俗习气的“压实的黑色咸鲟鱼子”，甚至不是庸俗习气的，而是卑贱的，因为达到了极限以及弥漫的庸俗习气就是卑贱。

——想一想吧，——这些想法可以令你得出与赫尔岑相同的结论，——想一想吧，你的头发都会竖起来。

赫尔岑有两点希望以期拯救欧洲，使其摆脱中国。

第一点希望，较小的一点——期望社会变革。赫尔岑提出以下一个两难推理：

“如果人民被摧垮，——新社会也不可避免。但如果人民在克敌制胜，——社会变革便不可避免”。

试问：凭什么以及为什么摧垮社会愤怒的人民要将庸俗文化之内在精神起源也要摧垮？是凭借着什么样的新的信念、新的崇高精神之源泉？反抗无个性的蚂蚁窝的人类个性是怎样一股火山爆发般的冲力？

赫尔岑本人断言：

“在现在占绝大多数人（即在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小市民）之后站立着更多的候补者（即无产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小市民的风尚、观念、生活方式——唯一的奋斗目标；十种改变对他们已足够了。没有田地的世界、城市无产者的世界没有另一条拯救之路并且全部渗透着在我们看来是落后了，而在田间居民和无产者看来代表着文化水平和素养的庸俗习气”。

但是如果人民“都充满了庸俗”，那么，试问，人民将走向哪里？他们或是从现在尚不彻底的庸俗习气——走向未来彻底的庸俗习气，从不安全的资产阶级的蚂蚁窝——走向安全的社会主义的蚂蚁窝，从欧洲的黑色金属时代——走向中国的“黄色”黄金时代及永恒？饥饿的无产者和饱食的小市民的经济状况不同，但具有相同的形而上学与宗教——适中合理看法的形而上学，适中庸俗饱食的宗教。第四阶层与第三阶层的战争在经济上是切合实际的，正如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战争一般，这一战争在形而上学及宗教方面则是不实际的；到处是力量与力量的对抗，而不是上帝与上帝的对抗。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同样的误会——在表面的临时的争战之后——是内在的永恒的世界。

因此，对于人民靠什么战胜庸俗习气这一问题赫尔岑没有给出任何答案。的确，他本可以从其朋友、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那

里借用答案，本可以从社会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期望以另一种社会秩序代替此种，以大多数人的政权代替少数人的政权；无政府主义否认任何社会秩序、任何外在政权，赞成绝对自由、绝对的个性，——这一切开端之开端与一切结束之结束。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庸俗习气，似乎（尽管仅仅到适当时候，赫尔岑和巴枯宁均未预见到那新的更极端的论断）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是可以克服的。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的实力与弱点在于，社会主义预先决定着未来的社会创造并且不由自主地包含了永恒的中庸、庸俗习气的精神实质、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作为宗教的实证主义之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的后果。无政府主义的实力与弱点在于，它并不预先决定任何社会创造，没有用任何在过去面前对未来的责任束缚自己并且从庸俗的历史浅滩游向未知的历史深处之公海，在这里它面临着或是最终的毁灭，或是发现新的天空和新的天地。“我们应当破坏、仅仅是破坏，不要考虑创造，——创造不是我们的事，”——巴枯宁宣扬说。但这里自觉的实证主义已经在结束而隐秘的、无意识的神秘主义则在开始，尽管是无神论的、反上帝的神秘主义，但仍是神秘主义。当巴枯宁在“Dieu et état”^① 中将其“反神学论”，准确地说是“反有神论”视为无政府状态的理论基础，——他涉及过于危险的否定极限，在此缺点加缺点，否定加否定很容易地得出出乎意料的优点、某一倒逆的、无意识的宗教之绝望论断。巴枯宁的“绝对自由的人”太像幻想的“超人”、非一人，以致于赫尔岑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它，而他是害怕所有的神秘主义，胜过了庸俗习气本身，却没有意识到，对神秘主义的这种迷信的恐惧自身便带有某种神秘色彩。无论如何，正统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则免于落入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异端邪说之中。

^① 法语，“上帝与国家”。

在生命的最后，赫尔岑失去了或几乎失去了对欧洲社会变革的希望，并且，似乎是因为与其说是不再相信变革的可能性，不如说是不再相信其拯救力。

在前进的黑暗中曾燃起过最后的光亮，在来临的绝望中曾有过最后的希望，对似乎能拯救欧洲的俄国农村公社的希望。

2

如果说，赫尔岑是巴枯宁在揭露无政府主义的“地下活动”之无意识的神秘主义时的蒙菲斯托菲尔，那么，巴枯宁则应是赫尔岑在揭露作为欧洲之拯救者的俄罗斯公社的同样的无意识的神秘主义时的蒙菲斯托菲尔。

“你们大家都准备着原谅，——1866年巴枯宁在自伊斯黑写给奥加廖夫和赫尔岑的信中写道，——似乎准备拥护一切，如果不是直接，那也是间接地，只是为了你们的神秘主义的神秘之物——大俄罗斯公社不受侵犯，请不要为这一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可信的话生气，你们期待着这一公社不仅能拯救俄罗斯人民，而且拯救所有斯拉夫人的土地、拯救欧洲、拯救世界。并且，请问，你们为什么不屈尊一下，严肃地、清楚地对人们向你们提出的严厉指责作出回答：你们在俄国（农村的）木屋上绊了一下，并且世代代持守着自己对土地的权利而处于类似于东方人的呆板状态。为什么你们期待着这一在其昔日几十个世纪的存在中除了自身令人憎恶的奴役制度外一无所成的公社能够在未来创造非凡奇迹呢？宗法制习俗的令人憎恶的腐朽和完全的无法纪，人在世界面前的无权利以及该世界的压制一切、扼杀一切个体首创精神之可能性的重力，不仅是法律权利缺乏，而且在解决那一世界的问题时就连一般的公正的权利也缺乏，以及在与每一位弱小的、不富有的成员的关系上极其随意，对那些流露出丝毫独立性

的成员经常压制，准备为一桶伏特加酒而出卖所有权利及所有真理——这便是大俄罗斯农村公社今日的全部特点”。

正统派的赫尔岑对于持异端的巴枯宁的这一痛斥该如何回答？没有任何实证的东西，除了神秘主义的：credo，quia absurdum^① 并且，就如同巴枯宁对赫尔岑的“反神学”问题哑口无言一样，但这一问题仍旧是有关无政府主义，这一从实证主义的视点，即相对主义视点看无法理解的、绝对个性的绝对解放的过分强烈的神学基础。问题在于，赫尔岑与巴枯宁这两位都达到了一个极限的结论，在达到这一结论时，他们理应彼此目视着对方的眼睛，会心地大笑（像占卜官一样大笑）。但他们所希望成为的并非占卜官、旧的众神的祭司，而是新的众神的预言者，因此他们回避了彼此四目直视。每一位不愿嘲笑自己的人便嘲笑自己的仇敌；但在如此相互嘲笑时彼此的心头却似有猫抓。

那么，为什么由俄国公社对蚂蚁窝的管理应当使蚂蚁免于蚂蚁的劫数呢？

当赫尔岑从俄罗斯跑到欧洲时，他是从一种奴役落入了另一种奴役，从物质的——落入了精神的奴役。而当他想从欧洲跑回俄罗斯时，则是从欧洲运动落入新东方——落入俄罗斯的旧的“东方式的停滞”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从火光到火焰，两个东方中哪一个更好，旧的还是新的？正如孩子们说的，两个都不好。赫尔岑明知这个，但却装糊涂。当他从一个东方跑到另一个东方时，他是在逃避自我，在最终的意识，即既不相信欧洲，也不相信俄罗斯这一最后的意识之最后的恐惧中徘徊。

——得了吧，在这之后整个历史将朝向哪里？——在自己的一个绝望的哈姆雷特式的独白中他叩问自己。

——而世上的一切都朝向哪里？至于历史，我未曾创造历

① 拉丁语，“我相信，因为其荒谬”。

史，因此亦无须为它负责。

这不过是该隐式的回答。不过是拜伦式的黑暗，最后的“黑暗”，绝望的顶点，唯有人类的心灵方能感受的绝望。因为如果整个历史——毫无意义，那么便无以遮挡菜园——与庸俗、专横跋扈、反动作战。不管出现什么，反正整个世界——“独幕轻喜剧中的魔鬼”的世界；面对整个世界，便会发出如同在 1849 年革命后赫尔岑面对旧的欧洲所发的感叹：

“毁灭、混乱万岁！死亡万岁！”

或者，还有更坏的感叹：庸俗习气万岁！

“基督教搁浅了”，——赫尔岑如此断言。如果说，基督教搁浅了，那就是说，它曾经在深水处。为什么他不去研究基督教的这一深处呢？是否因为适合于基督教的浅滩的实证主义的测深锤达不到深水处。

与基督教一起，——赫尔岑补充说，——“搁浅的还有革命”。如果它们一同搁浅了，那么是否意味着它们拥有共同的浅滩及以共同的深度。浅滩——实证主义的——不信上帝者的绝对的庸俗习气；深度——宗教的——神里面的人之绝对的高尚。赫尔岑本人认可革命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的联系，也明白，“人权宣言”在基督教之前以及无基督教时是不可能出现的。

“革命——他说，——就如同宗教改革运动一样，立足于教堂的乡村墓地。“为了上帝与自由”，而为富兰克林的孙子祝福的伏尔泰，——是与瓦西里大公和戈里高利·纳济昂京一样的神学家，只是所属教派不同而已。天主教冷冷的月光的折射（即宇宙基督教的最伟大的尝试之一）经历了革命的所有命运。天主教的最后的话语是由宗教改革运动与革命说出的；它们发现了它的秘密；神秘的赎罪被政治上的解放所废除。尼西亚会议^①（注释见下页）的信仰的标志表现为在最后的基督教高级主教会议，即 1792 年议会的标志中对每个人的权利的承认。《马太福音》所宣扬的道德——正

是自然神论者让·让·卢梭所主张的。信仰、爱、盼望——在入口处，自由、兄弟之爱、和平——在出口处”。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似乎，在宣判欧洲文化的死亡，并远离它而跑向俄国的野蛮，处于最终的无信仰的绝望状态之前，理应想一想，这两个搁浅的世界文化之开端——宗教与社会性——能否以某种方式从其共同的实证主义的浅滩向其共同的宗教的深处转移？为什么赫尔岑对此未作思考呢？好象，一切都是因为：他对宗教之深处的恐惧甚于实证主义的浅滩；在一切神秘主义的深处他都仿佛看到反动派的狂暴的怪物，一种从深渊中走出的启示性的野兽。

不谨慎的巴枯宁则替谨慎的赫尔岑想到了，他将赫尔岑的社会学的两难推理引入神学的或“反神学”的两难推理：“*Dieu est, donc l' homme est esclave. L' homme est libre, donc il n' y a point de Dieu. — — Je defie que ce soit de sortir de ce cercle et maintenant choisissons*”^②。“神是存在的，那就是说，人——是奴仆。人若自由了，那就是说，上帝不存在。我可以肯定，谁也走不出这个圈子，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抉择”。

“人类的宗教，——巴枯宁在最后写到，——应当建立在上帝之国的宗教的废墟之上”。

沃尔特断言：如果没有上帝，那就应当发明它。巴枯宁的论断则适得其反：如果有神，则应当将其消除。这使我想起了魔鬼致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话：

——应当摧毁人类身上存在的关于上帝的思想，这是有所作为的起步点。一旦人类都远离上帝，那么所有新生事物都将会降

① 公元325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在小亚西亚的尼西亚城召开帝国全境基督教主教会议。

② 法语，“如果神存在，那么人就处于奴役状态。如果人是自由，那么神就根本不存在。——不过，我真担心有谁肯摆脱封闭状态而维护其所选择的权利”。

临于世。

1869年在柏林召开的“和平与自由”联盟大会上，巴枯宁提出，社会主义纲领的基础是否定所有的宗教，承认，“上帝的存在与人们的幸福、尊严、理智、道德以及自由不相符”。当大多数人驳回了这一决议时，巴枯宁和一些赞成这一决议的少数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名为“Alliance Socialiste”（“社会主义联盟”）的联盟，其中第一条宣称：“联盟自称为无神的联盟（athee）”。

这一狂热的“反神论”已不仅是宗教的否定，而且是否定的宗教，某一无上帝的或是反对上帝的新宗教，其中所充溢的狂热的竞争不亚于有神的旧宗教。得知巴枯宁要出席柏林大会，屠格涅夫颇感吃惊。“他怎么啦？”——屠格涅夫向所有的人发问，——要知道他永远是一个信徒，他甚至还斥责赫尔岑的无神论。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可以理解，为什么魔鬼要除去人身上的关于上帝的思想：正是因为它仇恨上帝，才成为魔鬼。但就巴枯宁而言，尽管其狂热的无神论思想，——他不是魔鬼，而是一个普通人，并且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那么他是怎么啦，为什么突然仇恨起上帝的名字，并且开始象一个狂人一样褻渎上帝？

“如果有上帝，那么人——奴仆”，巴枯宁如此断言。为什么？因为“自由，是对任何政权的否定，而上帝就是政权”。巴枯宁将这一论旨视为公理。的确，假如没有基督，这便是公理。但基督向人们揭示了，上帝——不是政权，而是爱，不是外在的政权力量，而是内在的爱。爱人者不愿奴役被爱者。在爱人者与被爱者之间除了爱的政权别无其他政权；但爱的政权已非政权，而是自由。

完美的爱——是完美的自由。上帝——是完美的爱，因此，也是完美的自由。当圣子对圣父说：将降临的不是我的意志，而是你的意志——这不是奴性的顺从，而是爱的自由。破坏圣父的

意志并非是圣子力所不能而是不愿，是因不愿而不能。

巴枯宁的那论证仇恨与奴役之上帝，即实质上，并非上帝，而是魔鬼的两难推理可以与另一两难推理，即论证上帝，爱与自由的上帝两难推理想对立：

“上帝存在，——意味着人是自由的；人是奴仆，则意味着没有上帝。我可以肯定，谁也走不出这个圈子。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抉择”。

所有相信上帝者均为奴仆，——赫尔岑也会赞同巴枯宁的这一观点。但不能将有关上帝的思想，最高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的思想从属于最低的历史方式的经验。简直是，所有信仰上帝者均为奴仆？那么同上帝相抗争的雅各、抱怨上帝的约伯、以色列的预言家、基督教的受难者呢？

期待着与关于上帝的形而上学思想作斗争的巴枯宁与赫尔岑实际上只是在与历史的幻影、与处于政治的低地之雾中的这一思想的曲解作斗争；不是与上帝之名而战，而是与那“魔鬼”、永恒的政治家，努力用以遮盖上帝的所有名中对它来说最神圣的和可怕的名：自由，以不为人们所见的亵渎行为作战。

当然，历史的最大的罪行，仿佛已非神人，而是人神的第二次受难，是在十字架、上帝的自由旗帜上人类的自由被钉上十字架。但是，难道巴枯宁和赫尔岑胆敢断言，参与了这一罪行的是受难者本人，基督希望人们受奴役？难道巴枯宁和赫尔岑从未想到，基督回答魔鬼的话中的含义，魔鬼提出给他支配彼岸世界所有王国的权力：因为它属于我，——魔鬼说，——我想把它给谁就给谁。如果那人说：地上和天上的一切权力都属于我，——他否认属于魔鬼的一切国家权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真正的、内在的爱的权力，基督的自由与外在的虚假的权力、奴役之间——存在着犹如神性王国与魔鬼之国之间一般的差异？难道巴枯宁和赫尔岑从未想到，基督这句话的含意何在：我教会你们真

理，真理将使你们变成自由人。如果对他们来说这是不稳重的话，那么，也许，实际上这只是没有被理解的，没有内涵的话：你们现在无法容纳；当他、真理之魂来到时，那么将会教导你们一切的真理。并教导那最后的使人们成为自由人的爱的真理。

在父神最初的王国、《旧约》中展示了作为真理的上帝的权力，在神子的第二王国、《新约》中展示了作为爱的真理；在圣灵的第三及最后王国中展示了作为自由的爱。并且在这最后的王国里将会发出并能听到最后的、任何人从未说过、也从未听到过的未来的神的名字：解放者。

但是在这里我们已经不仅走下了欧洲文化之岸，带着昔日与现在的庸俗习气，——而且也从所面临的赫尔岑所谓的未来的庸俗习气之岸上走了下来；我们游向没有任何岸的公海，游向作为统一的三位一体之启示的三个启示之一的未来基督教的海洋。

赫尔岑的悲剧——二重分裂：用自己的自我意识推翻，——无意识地寻找上帝。用与巴枯宁的两难推理中一样的自己的意识，从已接纳的前提：人是自由的——推导出结论：即，不存在上帝；无意识地感觉到逆向的两难推理之无法反驳性：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便没有自由。但是说：没有自由，——对于赫尔岑来说无所谓，如果说：人生没有意义，生与死均无目的。的确，他是在为那他已几乎不相信之物而生存、死亡。

这——不是新世界第一位预言家，而是旧世界、旧罗马的最后的士兵、垂死的角斗士。

豪放的罗马在欢呼……宽阔的竞技场群情激昂

掌声在轰鸣，——啊，他，胸被刺穿，无声地躺着。

在尘土与血中滑动着他的双膝。

这位角斗士与之搏斗的野兽——未来的庸俗习气。像自己的先辈、北方的野蛮人一样，他赤身露体、手无盾牌、武器出去战斗。而另一个野兽、昔日及现在的庸俗习气的“千年多头蛇、压